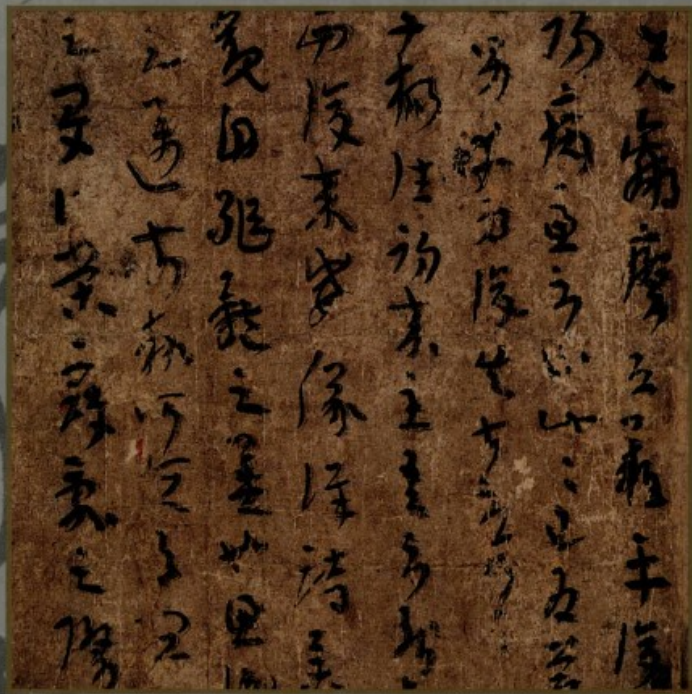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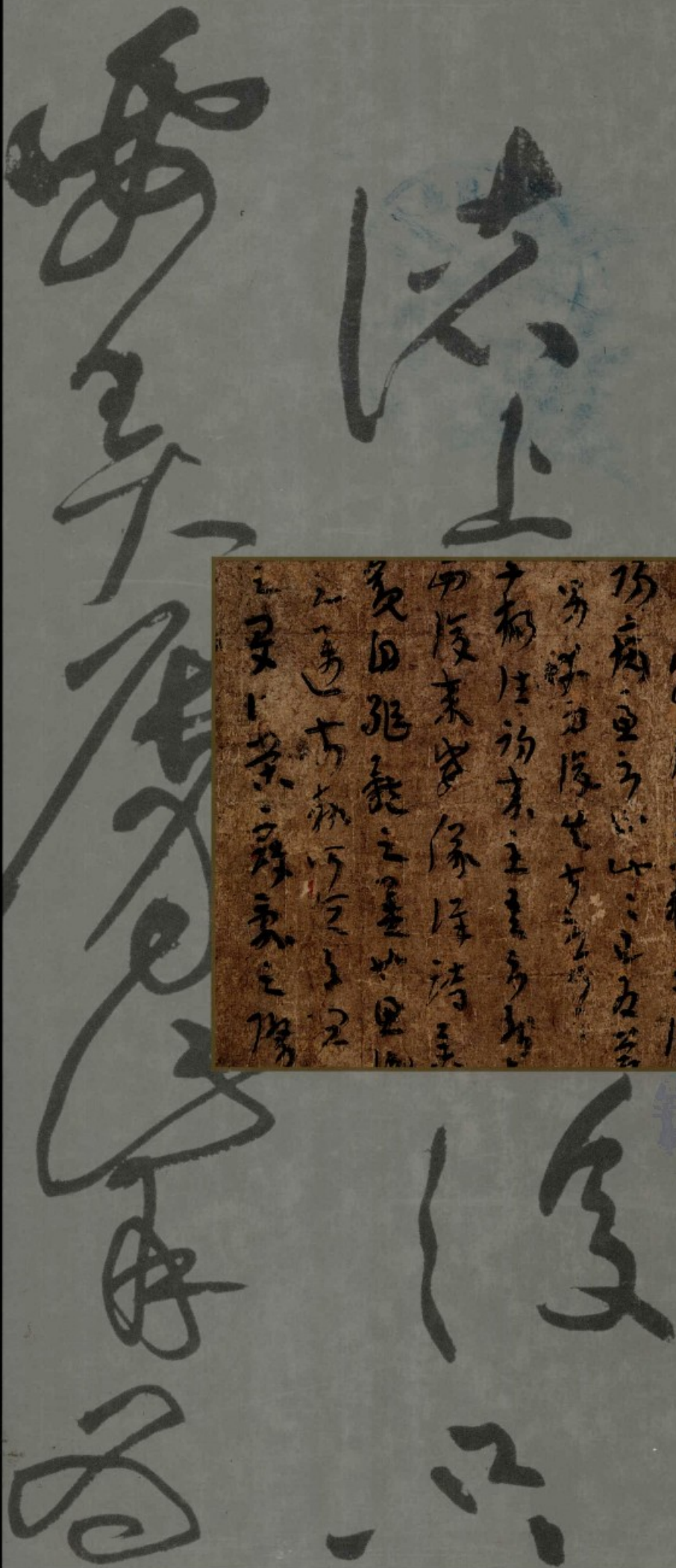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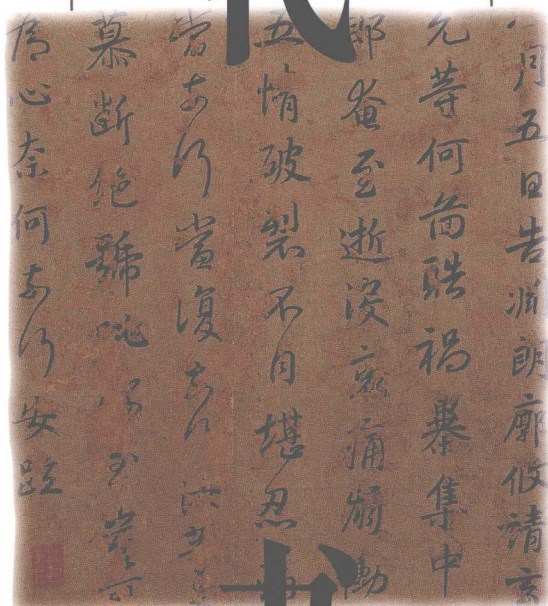
晋唐五代书法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晋唐五代



书法

主编：施安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J292.11
S485:1

晋唐五代书法

Calligraphy of the J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 编 施安昌
副主编 华 宁
编 委 李艳霞
摄 影 冯 辉

出 版 人 陈万雄 吴智仁
编辑统筹 张倩仪 胡大卫

编辑顾问 吴 空
责任编辑 段国强 周祖贻 王占军
设 计 张婉仪
出 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湾耀兴道3号东汇广场8楼
制 版 中华商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丽路36号中华商务印刷大厦三字楼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版 次 200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01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繁体版)
©200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体版)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规 格 大16开(216×286mm) 288页
国际书号 ISBN 7-5323-6090-3/J-35

版权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中文或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
转载本书图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本版图书仅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Condition of sale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distributed in Mainland China only.



故宮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特邀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襄	王 尧	李学勤
启 功	张政烺	金维诺
宿 白		

总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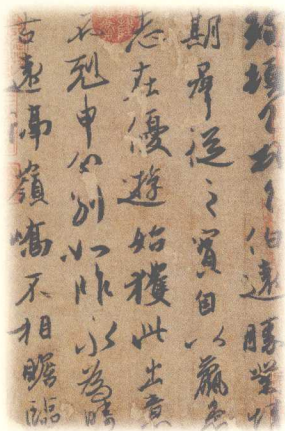
于倬云	朱诚如	朱家溍
孙关根	杜迺松	李辉柄
邵长波	张忠培	肖燕翼
杨 新	杨伯达	单国强
郑珉中	胡 锤	施安昌
耿宝昌	徐邦达	徐启宪
聂崇正		

主 编： 杨 新

编委办公室：

主 任：	徐启宪		
成 员：	冯乃恩	杜迺松	李辉柄
	邵长波	单国强	郑珉中
	胡 锤	秦凤京	郭福祥
	聂崇正		

总摄影： 胡 锤



总序

杨新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占地72万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万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下诏将北平升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旧宫的基址上，开始大规模营造新的宫殿。公元1420年宫殿落成，称紫禁城，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国统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内。按古老的礼制，紫禁城内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辅以文华、武英两殿。后寝包括乾清、交泰、坤宁三宫及东、西六宫等，总称内廷。明、清两代，从永乐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仪，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这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将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文物移来，在紫禁城内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1924年，溥仪被逐出内廷，紫禁城后半部分于1925年建成故宫博物院。

历代以来，皇帝们都自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他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视作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宫廷内，不但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和奇珍异宝，而且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师，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品。中间虽屡经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收藏损失无法估计，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民富于创造，文物散而复聚。清代继承明代宫廷遗产，到乾隆时期，宫廷中收藏之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度侵入北京，横烧劫掠，文物损失散佚殆不少。溥仪居内廷时，以赏赐、送礼等名义将文物盗出宫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宫文物再次遭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清宫的收藏仍然可观。在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时，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所藏进行了清点，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28册，计有文物117万余件（套）。1947年底，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文物同时亦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战火的毁灭，故宫博物院从大量的藏品中检选出器物、书画、图书、档案共计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运至上海和南京，后又辗转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文物复又运回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被运往台湾，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运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于南京建造的库房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有所变化，根据当时上级的有关指令，原宫廷中收藏图书中的一部分，被调拨到北京图书馆，而档案文献，则另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核对，按新的观念，把过去划分“器物”和书画类的才被编入文物的范畴，凡属于清宫旧藏的，均给予“故”字编号，计有711338件，其中从过去未被登记的“物品”堆中发现1200余件。作为国家最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肩负有搜藏保护流散在社会上珍贵文物的责任。1949年以后，通过收购、调拨、交换和接受捐赠等渠道以丰富馆藏。凡属新入藏的，均给予“新”字编号，截至1994年底，计有222920件。

这近百万件文物，蕴藏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极其丰富的史料。其远自原始社会、商、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五代两宋、元、明，而至于清代和近世。历朝历代，均有佳品，从未有间断。其文物品类，一应俱全，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印玺、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文房珍玩、钟表、珠翠首饰、家具以及其他历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可以说这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凝聚着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开发这座宝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提供了解和研究这一传统的可信史料，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我院曾经通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刊物，为提供这方面资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各科学术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故宫文物以一窥全豹的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来得及进行。今天，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故宫。学者专家们，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从事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也都希望从故宫的藏品中发掘资料，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因此，我们决定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故宫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册。

要想无一遗漏将近百万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数十年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同时，不能不采取精选的办法，百里挑一，将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来，约有一万二千余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这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说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六十卷的体例，我们采取按文物分类的方法进行编排，但是不囿于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与宫廷历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则采用特定主题的编辑方法。这部分是最具有宫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历史价值。另外，对某一类数量较多的文物，例如绘画和陶瓷，则采用每一卷或几卷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编排方法，以便于读者的需要和选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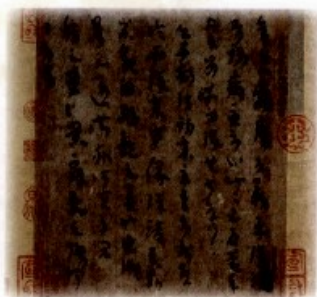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务是艰巨的。为此我们动员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内老一辈专家和聘请院外若干著名学者为顾问作指导，使这套大型图册的科学性、资料性和观赏性相结合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务由中、青年人承担，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当我们刚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和建设性意见，使以后的各卷，能达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忠诚合作！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们进行这一事业的人们！

1995年8月30日于灯下

导言

华 施
安
宁 昌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唐五代书法作品包括名家法帖、敦煌写经和高昌砖三部分，可代表这时期书法艺术的主要成就。

晋唐名家法帖

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晋唐五代法书，在书法史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名家法书能够传世至今，有赖于历代公私藏家的不懈积累和谨慎呵护。它们承载着千年历史变迁的印记，其聚散分合记录着人世沧桑。

本世纪初，清代末帝退位前后，度藏于宫廷的大批历代名品流散而出，其中也包括素有“三希”盛名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二帖流出宫后，辗转归古董商郭世五，郭遂在《伯远帖》上钤“郭氏觐斋秘笈”印。1949年其子郭昭俊在香港借款，将二帖抵押给银行。1951年借款到期，郭家无力赎回。在此情势下，中国政府决定购回。至今，故宫博物院档案中还保存着1951年11月8日由总理周恩来批覆此事的电报抄文。与二帖相比，陆机《平复帖》的回归更为漫长曲折。此帖原存清乾隆内府，乾隆四十三年（1777）从宫中赐出后在王孙国戚手中递传了160年。1937年，帖的主人溥儒为筹集丧费将其待价而沽，经傅增湘等从中斡旋，著名收藏家张伯驹以巨金易此宝翰。1956年张氏夫妇将《平复帖》无偿捐献给国家，同时捐献的还有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钜迹。其它如谢安《中郎帖》、王羲之《雨后帖》、杨凝式《夏热帖》等也陆续收回充实原藏，故宫晋唐五代法书遂成大观。

本卷将故宫博物院藏晋唐五代名家法帖全部收入。目前所知存世两晋法书作品（包括唐宋临摹本）约二十余件，故宫存六件，代表着由古风向今体转型的书势。唐、五代藏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家名作，像欧、虞、褚、颜、柳、杨凝式等作品，有十一件；三卷临摹本“兰亭”，各有千秋。另一类是诗人书迹，李白《上阳台帖》和杜牧《张好好诗》，皆为诗书合璧之作。

从法帖看晋唐书法的主流

(一) 西晋与东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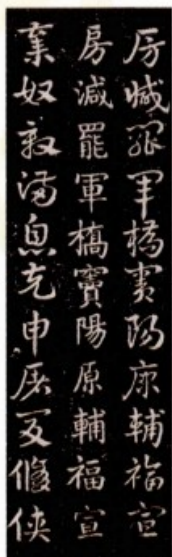
谈到两晋书法，首推陆机《平复帖》（图1），此乃年代最早并且真实可信的名家法帖，是书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作品，历代著录，评价甚高，可谓众口一词。但论及其书体，则仁智互见，有“章草”、“非章草”、“存篆法”三说。拿《平复帖》与传世章草作品如皇象《急就章》（附图一）、索靖《出师颂》、《月仪帖》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结体颇有差异，很难将其归入章草体。那么，对《平复帖》应如何认识呢？魏晋时期的书体大致分为隶书、章草书、早期行书、今草书、楷书以及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的“新隶体”，从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及西北其他古代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写经中都可真切见到，这也是我们认识《平复帖》的可靠依据。如《十二月等字残纸》、《书不得等字简》（附图二）、《小人董奔等字残纸》



附图二 《书不得等字简》

和成熟起来。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新颖姿媚的风格，脱去了隶意，更多地融入楷书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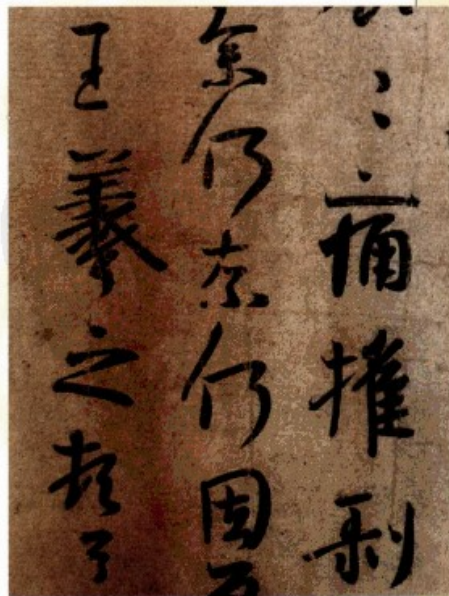
其实，王羲之学书之初也是由隶书着手，师法张芝、钟繇，随叔父王虞学习隶、草、飞白诸体。《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梁陶弘景《论书启》也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被认为是他早期作品的《姨母帖》（附图三）中可见其笔画短促而较少变化，结字疏朗，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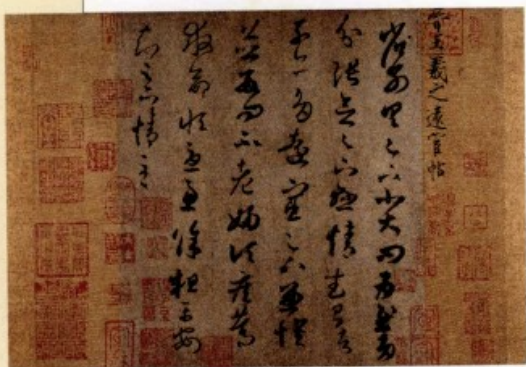
附图一 皇象
《急就章》

等，其字形均与《平复帖》相类。其特点是字与字不相牵连引带，但笔断意连，秃笔中锋直下，较少顿挫而多圆转随意性，不带燕尾。晋代书论评汉晋书家十之八九善“隶草”、“隶藁”应指这类，也就是隶书的率意、简省、快速的书写形式。楼兰简纸文字是魏晋时期日常所用文字，其中有不少字与《平复帖》毫无二致，可以互证，因此，其在文字演变史研究上的地位亦不可低估。古人未能见楼兰诸帖，面对《平复帖》洞心骇目，惊曰“高古”，“奇古”，使其成为后世书家孜孜以求而又难以企及的崇高境界。

进入东晋以后，随着笔墨技巧的日臻完善，今草和行书逐渐盛行



附图三 《姨母帖》



附图四 《远宦帖》

质朴，与楼兰文书中晋人残纸行书颇多相近。《远宦帖》（附图四）笔致转折多姿，部分笔法保存章草遗意。而后兼撮众法，脱尽隶意，变质为妍，突破钟书笼罩而创新格，形成自家体式。从现存唐搨王羲之诸帖如《初月帖》、《频有哀祸、孔侍中帖》、《丧乱、二谢、得示帖》、《平安、何如、奉橘帖》、《快雪时晴帖》等作品中，我们可欣赏到羲之书体与笔法的变化多姿和书风的妍美韵致。《兰亭序》历来被视为王羲之生平杰作，久已成为法书的冠冕，故宫收藏三件唐人临摹本，即虞世南摹《兰亭序帖》（图8）、冯承素摹《兰亭序帖》

（图7）、褚遂良临《兰亭序帖》（图9），应是众多传本中最忠实于原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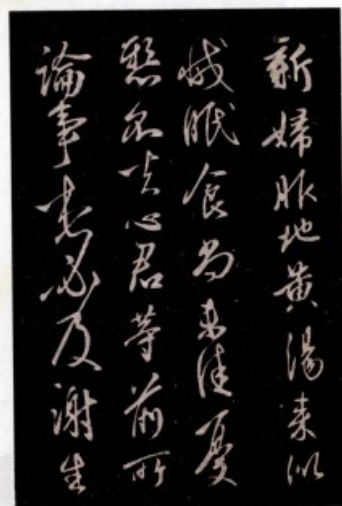
“右军肇变古质”（唐李嗣真《书后品》），突破旧风创新体，将书法带进技巧华美的境界，而献之犹嫌不足，遂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他顺应追求妍美的时尚趣味，发展了王羲之的新体，创造出一种介乎行、草之间的书体，即“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间”（唐张怀瓘《书议》）。父子二人相比，羲之书含蓄平和，以内涵风骨为美；献之书洒脱豪迈，以开张奇丽为美，对形式美的追求更甚于其父。从献之传世作品《鸭头丸帖》、《十二月帖》、《鹅群帖》、《地黄汤帖》（附图五）到本卷收入的《中秋帖》（图5）、《东山松帖》（图4），都有助于考索王献之在书法史上的深刻影响。

除羲献父子外，王氏家族书家辈出，王珣即其中之一。他的传世之作《伯远帖》是现存东晋可信的名家真迹，从无争议。此书多侧锋用笔，横向取势，字与字间绝少连属，书风率真随意，风神潇洒超脱，奇逸遒健，可睹晋人行草书真面。

（二）唐代与五代

唐代吏部铨选人材方法有四：“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辞辩证），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唐《通典》卷15）。楷法遒美的标准则是“二王”。唐太宗笃好右军书，亲为《晋书》本传作赞。还重金购求羲、献遗墨，赦命临摹《兰亭序》以赏赐朝贵，其时士大夫宗法王书蔚然成风。本书的三卷唐摹“兰亭”，公认为最精致、切近，足以取信于人，它们是初唐书史的绝好见证。

“晋韵”之下便是“唐法”。“唐法”即指楷法的严谨、成熟。楷体的流变，隋代分界。前期的楷书往往遗存隶书笔画的涩重味道，又常常随字型结构而自然安排笔画，疏密悬殊。直到唐初才变得方正匀圆，笔画相互顾盼。这个大变化，从本书中隋朝前后的佛经、钞书



附图五 《地黄汤帖》

来观察，耐人寻味。

上述两方面对于唐和唐以后书法影响至深且广。下边再谈本卷中有作品的八位名家。

欧阳询真行书在结体形态与用笔方面兼取二王法度，又吸收了北碑奇险势态，点画方正斩截，结体中宫紧聚，笔势外展，法度工巧森严。从《张翰帖》（图10）和《卜商读书帖》（图11）中，我们可领略其兼容南北众法的本领。和欧阳询相比，虞世南的书法更多地保留了纯正的大王（羲之）法，书风妍美端庄，于温润沉实中见刚柔，评者谓“虞得晋风之飘逸，欧得晋书之规矩”（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褚遂良书的法度和意趣在欧、虞之间，沉稳严整而又空灵丰艳。

初唐书家将师法二王和创立新法相结合，取得了卓越成就，但真正走出二王格局，树立唐代风规的当属颜、柳两家。颜真卿用笔圆浑沉劲，追求力感，结体饱满宽博，字字雄浑凝重，平正端整，一改传统妍媚古法，气度雍容。其行草书点画飞扬，天真发露，具有独特体貌和情境。柳公权书从颜体脱出，点画瘦挺，方圆互用，体势茂密奇峭，与颜书的平正丰腴异趣，于当时趋于肥俗的书风形成对照。米芾评其书“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海岳名言》）。



图10 《张翰帖》

诗歌与书法，前者发乎心声，后者形诸笔墨。二者之间的共性，使得唐代诗人多能书。《宣和书谱》在评价这种现象时称：“大抵书法至唐，自欧、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时词人墨客，落笔便有佳处。”书道的繁盛造就出众多诗人书家，李白与杜牧便是其中佼佼者。《山谷题跋》云：“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让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本卷所收《上阳台帖》（图12），字画飘逸，诗情豪迈，极见诗仙本色。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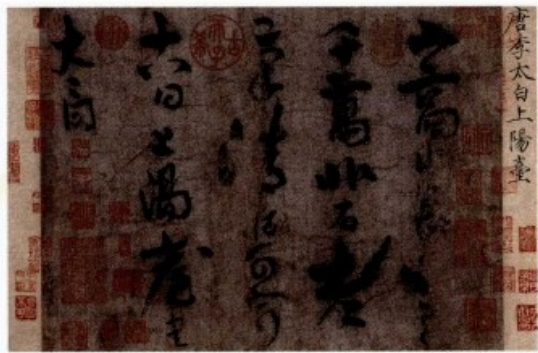


图12 《上阳台帖》

牧《张好好诗》（图15）乃自书诗稿，用笔、结体皆不甚经营，表现出萧散拙朴的逸趣，具文献与书法双重价值。

五代书法承唐代余绪，启宋人新风，杨凝式所作贡献尤为突出。他的真书“自颜柳入二王之妙，楷法精绝”（《邵氏闻见录》），真书中略带行体，跌宕有致，风韵独到。其行草“横

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天真烂漫”（米芾语），精神内蕴十分突出。其传世墨迹现只有《卢鸿草堂图》跋、《韭花帖》、《夏热帖》（图19）、《神仙起居法帖》（图18），后二种收入本卷，均为赫赫名作。



图19 《夏热帖》

从印鉴看法帖承传的轨迹

古代印鉴是考察传世法帖承传轨迹的时代标志，也是我们鉴别真伪的重要依据。印鉴有官私之分，官印指皇室内府之印，私印即私家鉴藏印。钤押印记以为征信之用，是鉴藏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皇家收藏印，唐代有“贞观”印和“神龙”印。五代南唐有“集贤院御书印”、“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宋徽宗有宣和七玺，即：“御书”、双龙圆形印、“宣”“龠”、“宣和”、“政”“龠”、“政和”、“内府图书之印”。南宋高宗有“希世藏”、“绍”“兴”、“睿思东阁”、“内府图书”、“机暇清玩之印”等。金章宗有“明昌”、“明昌宝玩”、“御府宝绘”、“内殿珍玩”、“群玉中秘”、“明昌御览”、“秘府”等七玺。元文宗有“天历之宝”、“天历”、“奎章”、“都省图书之印”、“奎章之宝”等印。明洪武内府有“典礼纪察司印”。清乾隆有五玺，即“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有时增至八玺或更多。

与官印相同，私印见于书法也始于唐代，但历代收藏家举不胜举，因此数量上私印要比官印多。仅举重要的，像唐代李泌的“邺侯图书刻章”，王涯的“永存珍秘”。北宋苏耆、苏舜钦有“四代相印”、“许国后裔”、“武乡之记”等印。米芾有“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等印。南宋贾似道有“魏国公”、“悦生”、“秋壑图书”、“似道”、“长”等印。元鲁国大长公主有“皇姊图书”、“皇姊珍玩”等印。此外，郭天锡、赵孟頫、乔篈成等人都是极有鉴赏力的，他们的印记在古法帖上也常可见到。

明代大收藏家项子京的鉴藏印数量惊人，常见的有“项元汴印”、“子京珍秘”、“项子京家珍藏”、“项元汴氏审定真迹”、“樵李项氏世家珍藏”、“天籁阁”等印。清代梁清标富藏书画，有“甲天下”之称，所藏历代名品，绝大部分是真迹，属于他的印记有“梁清标印”、“河北棠村”、“蕉林书屋”、“苍岩子”、“冶溪渔隐”等。继梁氏之后，安岐是又一重要收藏家，许多墨林钜迹都经他鉴藏，仅本卷就涉及十二件。常用印记有“安岐之印”、“朝鲜人”、“安仪周家珍藏”、“麓村”、“思原堂”等。

近现代收藏大家张伯驹曾藏多件法帖名迹，上钤张氏夫妇之印有“张伯驹父珍藏印记”、“张

伯驹珍藏印”、“伯驹”、“吴郡潘素”等。

上述印鉴多见于本卷作品当中。熟识历代鉴藏印记，掌握其钤押规律，可辅助我们断定时代，辨认真伪。也正因为如此，作伪者往往采取各种手段伪造、钤押假印章，以欺骗世人。而在本书传世法帖上存有唐、宋、元、明、清直至现代大量完好的官、私印鉴，不仅反映了作品鉴别和流传情况，而且也为读者提供了真实而系统的印鉴资料。

从题跋看历代学者的鉴识

与印鉴相比，古人的题跋对判定作品的时代与作者，无疑更具影响力。题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记叙作品的来历和流传情况，有的考辨真贋是非，而那些善鉴者的题跋对后人认识作品尤其起到关键性作用，甚至藉此而奠定其名品的地位。

以虞世南摹《兰亭序帖》为例，明代董其昌跋中称：“此卷似永兴（虞世南）所临，曾入元文宗御府”，清代梁清标遂将董其昌的推测凿实，题签为“唐虞永兴临禊帖”。此后，清乾隆皇帝便在题跋中说：“此卷经董其昌定为虞永兴摹，以其于褚法外别有神韵也。”《石渠宝笈》著录此卷时也标称虞世南。这样虞摹之说就被沿袭下来。

冯承素摹《兰亭序帖》的定名也有类似情形。元代郭天锡在获此初唐精摹本后，跋谓：“右唐贤摹晋右军《兰亭宴集叙》，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此定是太宗朝供奉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明代文嘉跋语也称：“若其摹搨之精，钩填之妙，信非冯承素诸公不能也。”而项元汴遂将此帖确认为“冯承素奉敕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此后遂无异议。

宋徽宗为欧阳询《张翰帖》跋云：“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祖闻而叹曰：询之书名，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庭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这段论述对欧体的典型特征作了精辟概括，至今为研究欧书者奉为圭臬。

除上述题跋之外，本卷见识独到、足资借鉴的题跋还很多，如邓文原跋王羲之《雨后帖》，宋濂跋虞世南摹《兰亭序帖》，米芾诗题褚遂良临《兰亭序帖》，鲜于枢跋冯承素摹《兰亭序帖》，宋徽宗、张晏、欧阳玄跋李白《上阳台帖》，王钦若、鲜于枢、赵孟頫跋《夏热帖》等等。可以说，这些名品的地位与后世名家的题跋是密不可分的。

但古人题跋中也有不足为凭者，如柳公权《兰亭诗》（图17）是凭借宋代黄伯思的题跋而定名的，跋中称：“此卷唐谏议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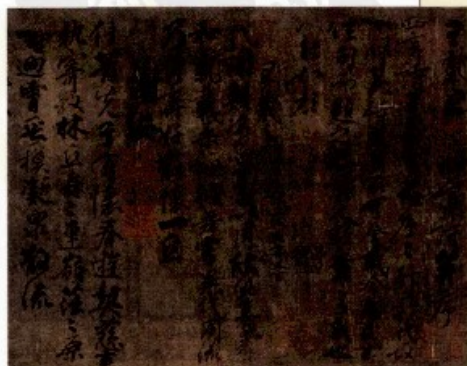


图17 《兰亭诗》

柳公权书，故自不凡，当为希世藏也”。但与黄氏《东观余论》相校，跋文中有多处改窜，所具官衔与年代不相符合，再结合黄跋笔法和书风等方面考察，可判断黄跋属明人伪迹，因此所谓柳公权书就难以成立了。尽管此卷自明中期以来被一致推崇为柳氏真迹，并被列入清乾隆帝的《兰亭八柱》，但从书法特征和艺术水平来鉴别，可以断定非柳公权之笔，而是一般书手的抄本。

传世的摹本和临本

与考古发掘出土的其它文物不同，传世法帖因流传千百年，递传情况复杂，因此存在真伪鉴别问题。就本卷作品而言，也并非全部是真迹，其中有临本，有摹本，也有仿本。临本是面对原作，边看边临；摹本是将透明的蜡纸蒙在原迹上面，映着日光，仔细钩摹轮廓再填墨，即“双钩廓填本”，又称“响搨”；仿本是在没有蓝本的情况下，凭自己的印象，仿学某人笔迹。三种方法相比较，在忠实存真方面，当以精细的摹搨本最具神形兼备的特点，在真迹无存的情况下，“下真迹一等”的唐宋摹本自是价值连城。这中间，又以唐摹本最精。拿王羲之诸帖来说，《姨母帖》、《初月帖》、《远宦帖》、《寒切帖》、《平安》等三帖、《丧乱》等三帖、《频有哀祸》等二帖、《快雪时晴帖》等，都是唐摹精品，保存了王羲之书法原本的面貌，是供研究探索的第一手材料。这些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视与真迹等同了。与摹本相比，临、仿本虽与原作品的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显出自然生动之趣，因此自古为世人所珍重。在鉴别真伪时，对古临、摹、仿本应区别对待，慎重去取。

可以这样说，在五代以前，名家法书赖摹本得以传真、流布。宋兴刻帖，又增一途。但人们仍看重摹本，常以“真迹”相称，与刻帖有所区别。直至近代，照像印刷技术发达，才将摹本取而代之。不过，摹搨仍可作为学书的有效方法之一，这当然是摹本的另外一种意义了。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至五代墨迹还包括写经和其他写本、高昌砖。它们是近百年来发现的书法史新资料，倍受学界看重。

敦煌写经

写本中绝大多数是佛经，道经甚少。其它写本有韵书、题写、账契、十二时歌等。其来源，基本上是从敦煌藏经洞所出，后经私家（如徐石雪、邵洵美先生）收藏再捐献故宫，或由国家文物局拨给。个别的则是中原和内府故物，虽累经尘劫，赖神力呵护，至今完好，如唐代吴彩鸾《书刊谬补缺切韵》、国诠写《善见律》、《黄庭经》等。此外，尚有古藏文、梵文、日文等写卷，不在本书选取范围之内。

佛经计一百余件，有标题的六十五件，有题记的十八件。上至晋，下迄宋，历代都有。纪年最早的是元魏延昌二年（513年），最迟者是北宋太平兴国十年（985年）。其内容包括三十多种经、论。字体不同，草书两件，行书六件，其它为隶楷和楷书。还有小字写经和

朱墨写经。

佛经是为信徒作功德用的。为此，寺院要准备大量已写好的经卷供施主选购，买定后再写题记，此种经卷多施舍入寺院经藏内。寺院为补充经藏不时地也要雇人书写所需的佛经。

敦煌数万经卷中附写题记者仅千余件，尽管题记甚少，却能说明许多事情。一类为诵读、抄写，校勘尾题，若僧尼、经生所写则文字简单，如本卷所收唐僧智行书《瑜伽师地论》卷第四十题记：“大中十年（856年）六月十六日沙门僧智惠山随听学书记”（图29）。若官府所写则较详。另一类是祈愿、修功德写经题记，题记人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坊里百姓，除祈愿文字外还每每交代时间、地点、背景、供养人状况等等。

抄经有一定格式：先在写经纸上画出乌丝界栏，每纸为十九到廿一行，每行一般写十七字。卷首写经名、品名，卷尾写卷号和题记。写经者有官家与个人之分，下面着重谈谈官写本。

（一）中央政府的写经

敦煌佛经中有不少是唐中央政府写校的原本，或者从政府校写本转抄的写经。这些原本或转抄本的卷尾，时常保留着翻译人、译定人和最初校写人的题衔。这些本子书写正确，工整，书法精妙，传到地方起着范本的作用。

唐代内阁六省之一的门下省下设门下坊，专事诏令经典抄写，其人员称“群书手”。门下省下属的弘文馆也有专职抄写经典的人员称“楷书”或“楷书手”。秘书省隶中书下，有楷书手八十人。政府部门之外，还有左书坊、左春坊雇用楷书写经人，从佛经题记可以看到这些情况：

国诠《善见律》题记：“贞观廿二年（648年）十二月十日口口国诠写，用大麻纸七张二分。净住寺沙门道嶷初校，会昌寺沙门法伦再校，会昌寺辅文开装，门下坊主事臣马仁义监，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臣赵模监，左武卫仓曹参军事卢争臣监，殿中尚乘直长僧蔚丹监，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总监”（图24）。

从题记中可知，此卷出门下坊，国诠上盖缺“群书”两字，不知何由刮去。国诠，太宗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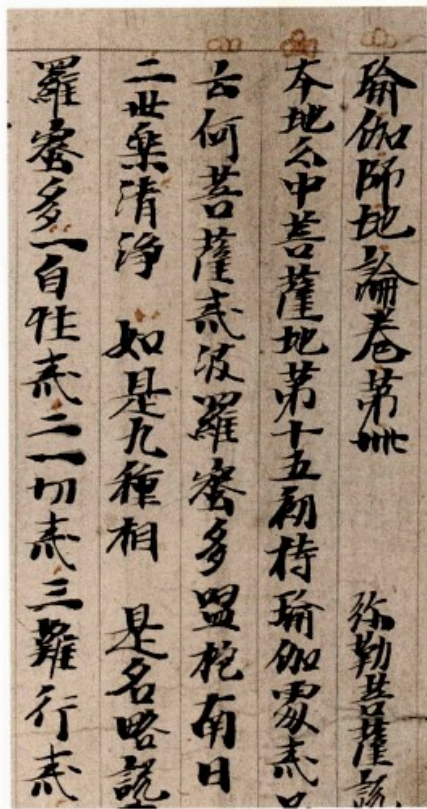


图29 《瑜伽师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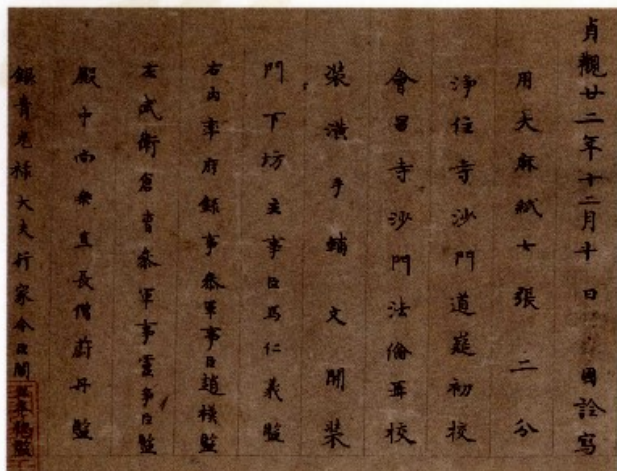


图24 国诠《善见律》

人，贞观中经生高手，细楷精熟匀净而近媚。赵模，太宗时翰林供奉搨书人，正书甚工，尤擅临仿。始习羲、献，将王字集成“千文”，其合处不减怀仁（按：释怀仁曾集王羲之书缀成《圣教序》，摹刻于碑，今在西安碑林）。又许敬宗所撰《高士廉莹兆记》，由赵模为其书（《金石录》、《宣和书谱》）。阎立本是大画家。

观经卷笔锋使转，墨华绚烂，神契虞（世南）、褚（遂良）韵致。《唐六典》卷八载：“贞观元年（627年），敕现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有性爱学书而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按：弘文馆）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这里“法书内出”即指观内府所藏法帖，其内容从褚遂良《右军书目》、李嗣真《书后品》可以了解。当中的小楷名帖《曹娥碑》、《乐毅论》、《东方画像赞》、《洛神赋十三行》今天还可以从刻帖看到。由此可知，楷书、群书手们是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下训练出来的。学者启功先生评谓：“唐人楷书高手写本，莫不结体精严，点画飞动，有血有肉，转侧照人。校以著名唐碑，虞、欧、褚、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诸名家，并无逊色。”（《论书绝句》）

观经卷笔锋使转，墨华绚烂，神契虞（世南）、褚（遂良）韵致。《唐六典》卷八载：“贞观元年（627年），敕现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有性爱学书而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按：弘文馆）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这里“法书内出”即指观内府所藏法帖，其内容从褚遂良《右军书目》、李嗣真《书后品》可以了解。当中的小楷名帖《曹娥碑》、《乐毅论》、《东方画像赞》、《洛神赋十三行》今天还可以从刻帖看到。由此可知，楷书、群书手们是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下训练出来的。学者启功先生评谓：“唐人楷书高手写本，莫不结体精严，点画飞动，有血有肉，转侧照人。校以著名唐碑，虞、欧、褚、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诸名家，并无逊色。”（《论书绝句》）

（二）敦煌经坊写经

为了分析敦煌镇经坊情况，不妨将北魏令狐崇哲经坊写经题记十则录写出来：

（1）永平四年（511年）《诚实论》卷第十四：“七月廿五日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典经师令狐崇哲，校经道人惠显”（斯1427）。

（2）延昌元年（512年）《诚实论》卷第十四：“八月五日敦煌镇官经生刘广周所写论成讫。典经师令狐崇哲，校经道人洪儒”（斯1547）。

（3）延昌二年（513年）《华严经》卷第四十一：“四月十五日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此经成讫。用纸廿三张，典经师、校经道人令狐崇哲”（图21）。

（4）同年，《华严经》卷第十六：“七月十九日敦煌镇官经生令狐礼太写此经成讫。典经师令狐崇哲”（斯2067）。

（5）同年，《华严经》卷第三十五：“七月廿三日敦煌镇经生师令狐崇哲所写经成讫记”（伯